

天主教在「主義時代」的調適

——以徐宗澤解讀三民主義為例

● 王鵬璋

摘要：學術界對近代中國的「主義時代」已經有較為豐富的認識，但令人遺憾的是，前輩學人較少論及「主義」與宗教的關係。本文以民國時期著名中國天主教知識份子、天主教中文刊物《聖教雜誌》主編徐宗澤為研究對象，聚焦於其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後所撰寫的一系列解讀三民主義的文本。在「主義時代」來臨的壓力下，徐宗澤不得不對「主義」作出回應。隨着政治形勢的變幻，他不斷調整其對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教育的態度，其主編的《三民主義》導讀教材還遭遇了帶有官方色彩的修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徐宗澤在言論上對三民主義批評的淡化，並不意味着他完全服膺官方意識形態，而是反映了天主教在「主義時代」的調適。

關鍵詞：徐宗澤 《聖教雜誌》 三民主義 黨化教育 社會主義

張灝論及「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1895年至1920年初）時提到，「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曾出現在轉型時代的每一個主要階段或者思潮裏，並進一步區分出「軟性」與「硬性」兩種「烏托邦主義」，前者以康有為與胡適為代表，寄望完美的未來在歷史進程中緩慢實現；後者以譚嗣同、劉師培、李大釗為代表，相信當下的現實社會可以被徹底改變^①。王汎森以「主義時代的來臨」為題，聚焦於轉型時代的「主義」論述，描述了「主義」觀念在此時期的轉變：「主義」一詞在中國出現三十餘年後，已經變成一種試圖解決一切問題的良藥、時

* 本文原為筆者碩士論文〈民國年間聖教雜誌對社會問題的探討〉的延伸內容，後單獨成文，感謝吳滔教授和曹新宇教授的悉心指導。在論文寫作與修改的過程中，曾先後在北京大學主辦的「傳統與變革：轉型期的東亞社會」博士生論壇，廣東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第三屆孫中山與近代中國青年學術研討會」，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主辦「孫文共同研究班」上宣讀，得李吉奎、江中孝、彭劍、劉清華、承紅磊、王龍飛、譚娟、趙崢、盧華等諸位老師提供寶貴意見。《二十一世紀》審稿期間，又得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撥冗指正，唯文責自負。

人崇拜的對象、國家的指導思想^②。翁稷安繼續「轉型時代」之後的「主義」研究，討論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主義化」政策，也即「三民主義化」：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由多元闡釋逐漸定於一尊、三民主義的法制化、三民主義教育的演變、三民主義在地方社會與生活中的體現等^③。學者對「主義時代」的研究極大豐富了我們對這一中國近代歷史關鍵發展期的認識。

不過，略為遺憾的是，上述研究者雖然意識到主義逐漸呈現信仰化、宗教化的特點，卻較少討論「主義」與宗教的關係。翁稷安初步討論了國民黨將宗教信仰視為「迷信」進行整頓，以及宗教界利用三民主義進行辯護與宣教等問題。這種辯護話語在當時天主教刊物中亦可得見，例如「先生信仰宗教之威權，及其團結力，是出以至誠之心；且深信宗教上之道德，能補政治之所不及」，「信教自由，載在黨綱及約法；博愛平等，為總理革命之精神。是傳教與三民主義，並無抵觸」^④。事實上，「主義」與宗教的關係，可以1926年北伐前後為界分為兩個階段：1926年前，新式「主義」與各宗教信仰，更多是一種相互競爭的關係，宗教界對「主義」持觀望態度；1926年後，隨着國共兩黨力量的增強，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下統稱「社會主義」）脫穎而出，在當時的思潮中取得壓倒性優勢，其中三民主義更是因為日後國民政府的成立，獲得了名義上的「獨尊」地位，宗教界需要接受「主義」的領導。

隨着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國民政府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勢力，逐漸形成以國民黨為核心的黨國體制。在這一過程中，三民主義也在影響宗教界。目前學術界對三民主義與宗教的關係已經有一定研究。佛教方面，陳金龍認為此時期國民政府與佛教的關係是「衝突與調適」，侯坤宏則指出雙方的關係是「『黨義』普遍凌駕於『佛法』之上」^⑤，前者似乎認為二者為兩個相對平行的關係主體，後者則強調二者地位有高低之分。兩人討論的政教相處模式不同，但都論及佛教界對三民主義的友好評論。基督教方面，亦有教徒對三民主義持溫和態度，除了撰文評述三民主義的觀點外^⑥，還因孫中山的基督信仰，試圖將耶穌基督精神與孫中山革命精神相結合，建構一個有利於基督教的孫中山形象^⑦。

與佛教相比，天主教的外來背景更深；與基督教相比，法國保教權與教宗領導權制約着中國天主教徒，天主教對新式「主義」的接納程度較低，其對三民主義的觀點無疑是較為保守的^⑧。目前關於三民主義與天主教的研究，恰恰集中於本文研究對象——民國時期著名中國天主教知識份子、天主教中文刊物《聖教雜誌》主編徐宗澤，但論者多沒有系統蒐集徐宗澤關於三民主義的著述，僅選取部分觀點進行評述^⑨。劉國鵬討論了天主教會在國民政府國家整合過程中逐漸認可和學習三民主義的過程，雖有提及編寫三民主義教材的徐宗澤，卻並未深入剖析天主教道理與三民主義存在的張力^⑩。不過，劉文對本文的啟發在於揭示了徐宗澤解讀三民主義的文本形成背後複雜的政教關係，即國民政府對天主教的國家整合政策，包括對教會學校、教產以及意識形態的監管。既存研究已經揭示出國民政府成立前後宗教界對三民主義或拒斥、或迎合的態度，卻並未注意到其中可能存在的曲折。

本文以徐宗澤為研究對象，聚焦於其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後在《聖教雜誌》上發表的一系列解讀三民主義的文本。在「主義時代」來臨的壓力下，徐宗澤不得不對「主義」作出回應，不斷調整其對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教育的